

对拓跋鲜卑及北朝汉化问题的总体考察

马晓丽 崔明德

从258年拓跋力微迁居盛乐到581年北周为隋所代,拓跋鲜卑及北朝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汉化过程。从北魏皇室始祖到北魏前期,虽有汉化因素,但其主流思想是坚守本民族习俗和文化。北魏中期,积极推行全面汉化政策。北魏后期,部分鲜卑人对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改革进行反思、清算甚至猛烈反扑,曾一度出现了新的鲜卑化倾向。东魏、北齐对汉化政策反扑最为激烈,胡风、胡俗越来越重。西魏、北周虽有胡风、胡俗回潮现象,但幅度较低,范围较窄,主要是对孝文帝以来汉化之路的逐步回归和对民族关系的不断调适,为消灭北齐、统一北方并为隋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 拓跋鲜卑 北朝 汉化 历程

作者马晓丽,1962年生,烟台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崔明德,1959年生,烟台大学民族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地址:山东省烟台市,邮编264005。

“汉化”是中国历史上边疆民族融入华夏文化的一种现象。就统一北方之前的拓跋鲜卑以及整个北朝的民族关系而言,汉化是一大主题。那么,拓跋鲜卑及北朝经历了怎样的汉化过程?在不同朝代、不同阶段汉化的程度如何?在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汉化是如何演变的?这些都是研究拓跋鲜卑及北朝汉化政策必须具体分析和认真回答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已从多方面对这些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和理论深度的观点,但大多是仅就某一阶段、某一事件或某个人物所做的微观研究,而且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也留下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的空间。如对拓跋鲜卑的汉化问题,不同学者认识不同,或认为“拓跋鲜卑早在力微至猗卢时期,因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加强,就逐渐接受了汉文化”;^①或认为,“鲜卑拓跋部在长期的南迁过程中,逐步接受汉文化,在宗教信仰、婚姻丧葬习俗、发式服饰、生活习惯、政治礼仪等方面与汉族日益趋同”;^②或认为,“鲜卑代国时期的历史进步是拓跋鲜卑接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③或认为,“道武帝拓跋珪复国,建立北魏政权,开始了汉化进程”。^④从以上观点来看,似乎在拓跋鲜卑的早期和北魏建立之初,就已汉化。但从整个拓跋魏的历史来看,从拓跋力微到北魏前期,虽有汉化因素,但其主流思想

①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

② 王万盈《拓跋鲜卑在汉化过程中的文化转变》,《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③ 何德章《鲜卑代国的成长与拓跋鲜卑初期汉化》,《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④ 黄云鹤《从〈魏书·礼志〉第一卷看拓跋鲜卑祭祀的汉化》,《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2期。

是坚守本民族习俗和文化；北魏中期，积极推行全面汉化政策；北魏后期，对孝文帝的汉化政策进行猛烈反扑，出现了新的鲜卑化倾向。再如对北魏后期及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汉化问题，学者的认识也有差异，或认为，“东、西魏及北齐、北周时期的汉姓胡化，是对孝文帝改制的一次逆转，但为时并不久，而且主要是作用于上层社会，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历史趋势，已不可逆转”；^① 或认为，北齐、北周所推行的“‘胡化’不是‘反汉化’的逆流，北齐、北周统治者为了稳固地立足于中原，他们都要在‘胡化’的前提下，走‘汉化’之路”；^② 或认为，“同北魏孝文帝时相比，东魏、北齐的汉化转入温和的状态，更大地发挥了它的潜移默化的文化改造功能”。^③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也有学者认为，北魏分裂后，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分别由高氏、宇文氏总揽朝政，一反孝文帝全面华化之道，极力提倡鲜卑化”；^④ 有的认为，“六镇鲜卑政权出现的鲜卑化趋势，是对孝文帝以来汉化政策的反动”。^⑤ 那么，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在鲜卑化的程度上，是否完全一样？我们是否可以等量齐观？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

本文拟对拓跋力微迁居盛乐到北周为隋取代期间鲜卑的汉化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全面考察，厘清其汉化的轨迹。

—

拓跋鲜卑的祖先原活动于东北大兴安岭的大鲜卑山，过着“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游牧生活，直到献皇帝时一直活动在“荒遐”地域。到诃汾即位后，才经过“九难八阻”，到达匈奴故地。三国时期，拓跋部又迁居河西。魏甘露三年（258），拓跋力微从河套北部迁居盛乐，“与魏和亲”。261 年，力微又派其子沙漠汗到曹魏，并与曹魏“聘问交市，往来不绝”。西晋建立之后，力微与晋“和好仍密”。从表面来看，拓跋鲜卑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但在主流思想文化方面，却坚守本民族的习俗和文化，反对“变易旧俗”。^⑥ 诸部大人迫害沙漠汗的行为，充分体现了当时拓跋部的主流思想。

沙漠汗于景元二年（261）被派到魏国都洛阳“且观风土”，学习中原的制度和汉族文化。魏晋禅代，他仍留于晋朝。泰始二年（266），沙漠汗因“父老求归，晋武帝具礼护送”。^⑦ 泰始十年（274），他重新回到洛阳。咸宁二年（276），沙漠汗回到拓跋部，被诸部大人害死。

拓跋部大人之所以要置沙漠汗于死地，虽有西晋离间的因素，但最为重要的还是这些部落首领担心沙漠汗执掌政权后会推行汉化政策，“变易旧俗”。在拓跋魏的早期历史中，“礼俗纯朴”^⑧ 是其基本状态和共同心理及主张，任何“变易旧俗”的念头和嫌疑都会遭受严

① 任玮 《南北朝时期胡姓汉化与汉姓胡化的政治目的溯源》，《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0 年第 5 期。

② 李红艳 《关于北齐北周反汉化问题的认识》，《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 年第 3 期。

③ 钱龙等 《东魏北齐的汉化形势》，《沧桑》2007 年第 5 期。

④ 刘学铤 《历代胡族王朝之民族政策》，知书房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7 页。

⑤ 段锐超等 《北魏六镇起义对政治格局和历史进程的影响》，《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⑥ 《魏书》卷 1 《序纪第一》。

⑦ 《魏书》卷 1 《序纪第一》。

⑧ 《魏书》卷 111 《刑罚志》。

厉惩处。而且,在这一时期,拓跋部总是处于颠沛流离之中,与中原汉族文化接触机会很少,即使有所接触,因其不断迁徙,影响程度较轻。因此,他们不可能也不会轻易改变本民族的习俗和文化,对其他民族的习俗和文化自然会持抵制态度。沙漠汗之死,突出反映了拓跋部反对汉化的阵容之大和势力之强,说明在拓跋鲜卑的早期历史中,坚守本民族习俗和文化是其主流思想,^①并非在拓跋力微至猗卢时期就逐渐接受了汉文化。

代国国君拓跋什翼犍因在后赵襄国居住 10 年,接受了一定的汉族思想文化。他曾任用汉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余官杂号,多同于晋朝”。^②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拓跋什翼犍只是采用了魏晋制度的官吏名称,并没有按照魏晋制度设置官吏。《魏书·官氏志》载“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分为南北部,复置二部大人以统摄之。时帝弟孤监北部,子寔君监南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直至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因而不改,南北犹置大人,对治二部”。由此可见,拓跋什翼犍“余官杂号,多同于晋朝”,只是部分采用了魏晋制度官吏之名,其实质内容仍是拓跋鲜卑的政治体制,并不能说明拓跋鲜卑当时就接受了汉族文化,更不能说明拓跋鲜卑当时推行了汉化政策。

尽管什翼犍本人具有比较强烈的汉化意识,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上层的认识不够统一,也难以推行其汉化政策。建国二年(339),什翼犍“欲定都于灏源川,筑城郭,起宫室”,但在与诸部大人讨论时,并没有达成共识。其母王氏劝说什翼犍“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③从王氏的话中可以看出,代国刚建立时仍以部落联盟为主,基本处于居无定所的游牧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按照魏晋的政治制度进行变革,也很难推行汉化政策。

北魏建立者道武帝拓跋珪虽然注意吸收汉族人士进入政权,把上谷张衮、清河崔玄伯等著名汉族豪强作为谋士,但其内心深处,还是坚守本民族习俗和文化。在拓跋珪看来,“国俗敦朴,嗜欲寡少”,因此“不可启其机心,而导其巧利”。^④据《魏书·官氏志》记载,“初,帝欲法古纯质,每于制定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魏书》又载“所制车辇,虽参采古式,多违旧章”。^⑤403 年,拓跋珪虽然“命有司制冠服,以品秩为差,然法度草创,多不稽古”,^⑥拓跋珪虽在初定中原时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⑦并任命世家大族崔逞为尚书,“使录三十六曹”,^⑧还采纳中原士大夫李先的建议,四处搜罗儒家经典,表现出对儒学的重视,但到天赐二年(405)即在鲜卑贵族保守势力的压力下,废除尚书三十六曹。^⑨拓跋珪在初拓中原过程中,虽对汉族士人“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

① 参见崔明德《北魏民族关系思想论纲》,《烟台大学学报》2010 年第 4 期。

② 《魏书》卷 119《官氏志》。

③ 《魏书》卷 13《皇后传》。

④ 《魏书》卷 33《公孙表传》。

⑤ 《魏书》卷 108《礼志四》。

⑥ 《资治通鉴》卷 113,安帝元兴二年。

⑦ 《魏书》卷 84《儒林传·序》。

⑧ 《资治通鉴》卷 109,安帝隆安元年。

⑨ 参见《资治通鉴》卷 114,安帝义熙元年。

能，咸蒙叙用”，也吸收他们“与参谋议”，但仅限于“宪章故实”^①的范围，而且还时刻对他们心怀戒备，防范甚严。凡军国大权、将相要职皆由拓跋鲜卑贵族担任，汉人即便能够参与军国大事，也只具象征意义，所谈意见仅作参考而已。拓跋珪对崔逞的赐死、对张袞的降职以及杀害贺狄干兄弟，就突出反映了他对汉族士大夫的防范心理和残酷打击，折射出他对其他民族习俗和文化的排斥态度。

崔逞是魏中尉崔琰之六世孙，以文才出众而闻名。表面看来，拓跋珪对崔逞非常器重，但内心深处，则时刻对他进行防范，即使对他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民族意识也要予以严厉打击。天兴初，东晋襄阳戍将郗恢因不敌后秦姚兴的进攻便向魏常山王遵乞师，因郗恢信中有“贤兄虎步中原”之语，拓跋珪“以言悖君臣之体，敕（崔）逞、（张）袞亦贬其主号以报之”。拓跋珪见崔逞、张袞的回信中写有“贵主”二字，勃然大怒，训斥他们说“使汝贬其主以答，乃称贵主，何若贤兄也！”^②遂将崔逞赐死，并将张袞由奋武将军、幽州刺史和临渭侯降职为尚书令史。即使对非常器重和信任的崔玄伯，拓跋珪也“尝使人密察”。^③由此可以窥见拓跋珪对汉族士大夫的戒备程度和防范心理。

贺狄干之死更能折射出拓跋珪及其大臣对待其他民族习俗和文化的态度。贺狄干因北魏与后秦和亲事宜被姚兴扣留在长安。义熙三年（407），后秦希望与北魏改善关系，贺狄干才离开后秦。

后秦虽是羌族贵族姚苌所建，但姚苌父子都非常重视儒学，汉化程度较高。史载姚苌曾下令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他在临终前告诫其子姚兴说“抚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④“仁”、“礼”、“信”和“恩”四项均为儒家学说的精髓。当时长安有一批“经明行修”的“耆儒硕德”传授儒家学说，“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在姚兴执政期间，“学者咸劝，儒风盛焉”。^⑤

贺狄干在长安“幽闭”期间，集中时间和精力“习读书史，通《论语》、《尚书》诸经，举止风流，有似儒者”。回到北魏后，拓跋珪“见其言语衣服，有类羌俗，以为慕而习之，故忿焉，既而杀之”。^⑥贺狄干之弟贺归也一起被杀。

贺狄干在长安多年，深受汉文化和羌文化的影响，既有儒者的学识和风范，又喜爱羌族的语言和服饰，自然会被坚守鲜卑习俗与文化的拓跋珪等人视为“异类”，所以，尽管他有“忠勤征伐之效”，^⑦但仍然逃脱不了被杀的厄运。由此可见，直到北魏初期，坚守本民族习俗和文化依然是鲜卑族上层人物的主流思想。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为了巩固统治地位，笼络汉族士大夫，既提倡儒学，建立太学，祭祀孔子，又将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贤俊之胄”数百人全部“差次叙用”，^⑧创造了北魏一次任用汉人最多的记录。但从拓跋

① 《魏书》卷2《太祖纪第二》。

② 《魏书》卷32《崔逞传》。

③ 《魏书》卷24《崔玄伯传》。

④ 《晋书》卷116《姚苌载记》。

⑤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

⑥ 《魏书》卷28《贺狄干传》。

⑦ 《魏书》卷28《张黎传·史臣曰》。

⑧ 《魏书》卷4上《世祖纪第四上》。

焘的思想和实践来看，他只想利用汉族上层人物和汉族思想文化为其服务，并不希望汉族上层人物和汉族思想文化动摇鲜卑族的思想文化，其内心深处仍然坚守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对汉族思想文化始终持有比较敏感甚至非常警惕的态度。在其执政时期发生的“国史案”和崔浩被杀就很能说明问题。

关于崔浩被杀的原因，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从崔浩自信乃至自负的性格寻找原因，有学者从崔浩对北魏统治构成威胁着眼，更多的学者则从民族矛盾分析原因。这些角度和思路都有一定道理，但结合北魏前期的主流思想来看，我们认为，崔浩想彻底汉化的所作所为突破了拓跋焘的底线，引起了拓跋焘的警觉和忧虑，担心以崔浩为代表的汉族上层人物会完全改变鲜卑族的思想文化，被汉族彻底同化。拓跋焘重用崔浩进行汉化改革是为了巩固北魏的统治地位，希望在维护北魏现有体制、基本保持高层官员民族结构和鲜卑贵族基本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有限度的改革。如果崔浩只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工作，并不至于引起鲜卑贵族的如此嫉恨。但崔浩却想彻底进行汉化改革，从根本上颠覆现有的政治生态，则超出了拓跋焘的底线，必然会引起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

崔浩之死充分说明，直到拓跋焘时期，北魏的主流思想文化仍是“旧俗”，任何想完全改变鲜卑“旧俗”、彻底汉化的念头及做法都会引起鲜卑贵族的警觉、忧虑和强烈抵制。我们知道，在十六国北朝时期，由少数民族建立的诸多政权中，从拓跋鲜卑早期到北魏前期，鲜卑族对其他民族习俗和文化排斥得最为激烈。南宋时期著名思想家叶适就明确指出：“刘、石、苻、姚与夫慕容，虽曰种类不同，然皆久居中国，其豪杰好恶之情，犹与中国不甚相异。独拓拔氏，则以真胡入主中原，纯用胡俗，以变华人。”^①

二

北魏最高统治者中主动进行较彻底汉化改革的是孝文帝拓跋宏。北魏建国后，许多君臣虽有一定的汉化意识，但又不愿彻底改变鲜卑族的文化和习俗，形成了“胡风国俗，杂相糅乱”^②的局面。孝文帝亲政后，在其祖母冯太后改革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大力推动鲜卑族的全面汉化。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主要有七大方面：一是迁都，二是改官制，三是禁胡服，四是断北语，五是改姓氏，六是定族姓，七是推动鲜卑族与汉族联姻。

考察历史上的汉化问题及汉化程度，主要应从如下几个方面设定标准：一是少数民族的主流思想；二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与汉族上层人物的合作程度，是否采用汉制；三是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水平及生活习俗等方面是否与汉族接近；四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是否并用，少数民族是否讲汉语；五是在血统上是否融为一体。按照这几条标准，孝文帝的汉化改革都基本符合。因此，我们说孝文帝推行的是彻底的汉化改革。

但是，我们也不能对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无限拔高。以往学界对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大都给予极高评价，认为他的改革促进了拓跋鲜卑的封建化和北魏国家的兴盛，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对其改革持否定态度，认为“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实际是扼杀鲜卑拓跋部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政策”，所有汉化政策导致的一系列活动，“都只是将

① 《习学记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8页。

② 《南齐书》卷57《魏虏传》。

民族自卑感发挥到民族投降主义程度的表现。它所导致的结果则是拓拔民族进取心和凝聚力的丧失,进而则是北魏政权的腐朽和速亡”。^① 我们认为,无论是对孝文帝全面汉化改革予以全盘肯定还是全盘否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只有对孝文帝全面汉化的思想动机和实践成效两个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②

应当说,孝文帝的汉化改革,确实力度大、手腕硬、影响广,对去掉鲜卑人身上的“胡气”及北方的民族融合,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对孝文帝汉化改革作用无限拔高也有悖于实事求是的原则。

其一,汉化改革并没有得到多数鲜卑人的拥护和积极响应,反汉化势力非常强大,决定了汉化改革的走向。迁都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孝文帝虽一再解释迁都的益处,但开始赞成者只占少数,多数表示反对。^③ 如太傅、录尚书事元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洛”,“皆所不愿”。^④ 孝文帝虽靠权术、阴谋手段和高压政策,逼迫大臣就范,但真正到迁都时,仍然“多有异议”,还有一半人持反对意见。^⑤ 直到“迁京之后,北蕃人夷多有未悟”^⑥ 者。孝文帝其他方面的汉化改革,也都遭到鲜卑贵族或明或暗的抵制,最终演变成一场叛乱。

其二,改革成效并不理想。禁胡服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另一项内容。在迁都洛阳之前,孝文帝就已安排李冲与冯诞、游明根、高闾、蒋少华等议定衣冠。在迁都的同年,他又下令禁穿胡服,但因“国人多不悦”,^⑦ 推行的效果大打折扣。如元丕对“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⑧ 朝廷议事时,其他大臣都改穿汉服,“朱衣满坐”,唯独元丕“胡服于其间”。^⑨ 在当时这虽是个别现象,但因元丕的特殊身份和极高地位,对这项改革的冲击力却不容低估。太和十九年(495),鲜卑族妇女的服装依然是夹领小袖,并没有彻底改变,气得孝文帝大发雷霆。直到太和二十三年(499年)洛阳仍然多见“妇人冠帽而著小襦袄者”。^⑩ 由此可见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成效并不显著。沈括通过亲自考察,得出了“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非古制”^⑪ 的结论。朱熹更明确地说“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直到唐朝初年,“服袖甚窄,全是胡服”。^⑫ 即使孝文帝也不得不承认“北人恋旧,南北纷扰”,^⑬ 改革难度较大。

① 赵向群、侯文昌 《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与拓跋民族精神的丧失》,《许昌学院学报》2003 年第 6 期。

② 崔明德 《北魏民族关系思想论纲》,《烟台大学学报》2010 年第 4 期。

③ 《北史》卷 15 《魏诸宗室传》载“诸公多异同,唯(元)赞赞成大策。”

④ 《魏书》卷 14 《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第二》。

⑤ 参见《魏书》卷 31 《于栗磾传附于烈传》。

⑥ 《魏书》卷 21 上 《广陵王传》。

⑦ 《资治通鉴》卷 139,明帝建武元年。

⑧ 《魏书》卷 14 《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第二》。

⑨ 《资治通鉴》卷 140,明帝建武四年。

⑩ 《北史》卷 18 《任城王澄传》。

⑪ 《梦溪笔谈》卷 1。

⑫ 《朱子语类》卷 91。

⑬ 《魏书》卷 19 中 《任城王传》。

其三，后孝文帝时期出现了新的鲜卑化倾向。一种文化融入另一种文化，需要较长的时间。从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到他去世，只有短短的六年时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要使鲜卑族彻底汉化是难以想象的。孝文帝去世之后，部分鲜卑贵族就对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进行反思和清算，逐步出现了新的鲜卑化倾向。

客观地说，孝文帝全面汉化改革的动机是好的，但由于其制度设计不太科学，而且又急于求成，脱离了当时的国情和鲜卑族的族情，在多数鲜卑贵族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必须进行汉化的情况下，通过强制性手段大力推行，很难收到理想效果。即使取得一定的成果，也需要付出很大代价。这也说明，任何一项重大改革，既需要设计合理，符合实际，又需要得到多数人的认同。所以，在进行重大改革时，首先要做各种风险评估。

三

孝文帝死后，有人开始对其全面汉化改革进行反思。北魏后期，部分鲜卑人又对他的全面汉化改革进行了一系列清算甚至猛烈反扑。六镇起义基本中断了北魏汉化改革的进程；东魏和西魏曾一度出现了新的鲜卑化倾向。

北魏初期，为了防御柔然的进攻，在拓跋焘时期，就“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①并沿北部边境建立了许多军镇。这些军镇的镇将大都由鲜卑贵族担任，镇兵除了如敕勒、吐谷浑、杂胡、江淮诸蛮、汉族等其他各民族及徙边的罪犯外，多数为鲜卑部族成员。起初，北镇官兵的地位较高，享受很多特殊待遇，能够成为北镇官兵是莫大的荣耀。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镇官兵的地位越来越低，特权逐步丧失，仕途也被阻塞。孝明帝正光年间，魏兰根就对尚书令李崇说“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平人，入仕次第，一准其旧。”^②但这遭到了朝廷的拒绝。孝文帝激进的全面汉化改革本来就遭到一些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那些继续留在北镇的官兵怨愤之气越来越大，遂对孝文帝全面汉化改革发起猛烈反扑。正光三年（522），怀荒镇士兵杀镇将于景起义。次年，沃野镇士兵在匈奴人破六韩拔陵领导下起义，“诸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③正光五年（524），高平镇民赫连恩起义，推敕勒酋长胡琛为主。破六韩拔陵先后在五原和白道击败魏军，起义军占领六镇。孝昌元年（525），北魏统治者勾结柔然首领阿那瓌镇压了起义军。陈寅恪先生认为“北魏晚年六镇之乱，乃塞上鲜卑族对于魏孝文帝所代表拓跋氏历代汉化政策之一大反动。”^④

尔朱荣在六镇起义对汉化改革反扑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更加猛烈的反扑。尔朱荣是秀

① 《魏书》卷4《世祖纪下》。

② 《北史》卷56《魏兰根传》。

③ 《资治通鉴》卷149，武帝普通四年。

④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页。

容川契胡酋长，其父尔朱新兴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享有“冬朝京师，夏归部落”^①的特权。尔朱荣本人身上的胡气基本没有多大改变，史载他“坐唱虏歌，日暮罢归，与左右连手蹋地唱《回波乐》而出”。^②永安元年（528），尔朱荣进军洛阳，立元子攸为帝（孝庄帝）。尔朱荣认为“洛中人士繁盛，骄侈成俗，若不加除剪，恐难制驭。”^③进入洛阳后，尔朱荣将胡太后和三岁的傀儡皇帝元钊沉于黄河，并在河阴之陶渚将汉族世家大族及汉化的鲜卑人几乎全部杀害。这是北魏末期对孝文帝全面汉化改革进行的最大反扑。

六镇起义和“河阴之变”对孝文帝汉化成果的破坏程度，《北齐书·儒林传》有一简要概括“因魏氏丧乱之余，属尔朱残酷之举，文章咸荡，礼乐同奔，弦歌之音且绝，俎豆之容将尽。”

北魏末期，部分鲜卑贵族不仅要恢复孝文帝改革之前的语言、服饰、姓氏和地位，而且还变本加厉地欺压汉人，《资治通鉴》卷 157 武帝大同三年九月条中就有“时鲜卑共轻华人”的记载。节闵帝普泰元年（531），高欢准备起兵时，就要求其部下“不得欺汉儿”，^④并对鲜卑族解释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可见当时歧视汉人的现象还是比较突出的。高欢在拥立孝武帝时就“复用夷礼”。^⑤北魏永熙三年（534），高欢出征尔朱兆时对大都督高昂说“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⑥这说明高欢信任的还是鲜卑族官兵。其实，这次战争的获胜，高昂所带领的汉族士兵起了重要作用。

北魏末期对孝文帝全面汉化改革进行反扑的另一表现，就是恢复鲜卑旧姓。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改姓氏，将本家族由拓跋氏改为元氏，所有功臣旧族，包括鲜卑族和其他北方民族，一律改姓，如将拔拔氏改为长孙氏、达奚氏改为奚氏、乙旃氏改为叔孙氏、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贺楼氏改为楼氏、勿忸于氏改为了于氏、尉迟氏改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纪”。^⑦但在孝文帝死后，就有部分鲜卑人开始侵蚀这项改革成果，如柱国大将军元子孝就在北魏末期“复姓拓拔氏”。^⑧但相对来说，恢复旧姓者多为鲜卑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如赫连达的曾祖库多汗“因避难改姓杜氏”。北魏孝武帝入关后，“诏复姓赫连”。^⑨再如前燕破灭后，“种族仍繁。天赐末，颇忌而诛之。时有遗免，不敢复姓，皆以‘舆’为氏。延昌末，诏复旧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犹号慕容，特多于他族”。^⑩

① 《魏书》卷 74 《尔朱荣传》。

② 《资治通鉴》卷 152，武帝大通二年。

③ 《北齐书》卷 20 《慕容绍宗传》。

④ 《北齐书》卷 1 《神武纪上》。

⑤ 《资治通鉴》卷 157，武帝大同三年。

⑥ 《北齐书》卷 21 《高乾传附弟昂传》。

⑦ 《资治通鉴》卷 140，明帝建武三年。

⑧ 《北史》卷 17 《阳平王新成传附钦子子孝传》。

⑨ 《北史》卷 65 《赫连达传》。

⑩ 《魏书》卷 50 《慕容白曜传附从子契传》。

四

在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对峙时期，东魏、北齐对汉化政策反扑最为激烈。

其一，恢复鲜卑语。“断北语”、讲汉语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许多鲜卑人逐渐淡忘了母语——鲜卑语。但到东魏、北齐时，又恢复了鲜卑语，在很大范围内，鲜卑语甚至成了通行语言。高欢在号令三军时就讲鲜卑语。祖珽因“解鲜卑语”和“解四夷语”而得到重用，文宣帝高洋“虽嫌其数犯宪，而爱其才伎，令直中书省，掌诏诰”。^①孙搴因“能通鲜卑语，兼宣传号令，当烦剧之任，大见赏重”。^②由于通晓鲜卑语会得到提拔和重用，所以原本不太精通鲜卑语的人纷纷学习鲜卑语。《颜氏家训·教子篇》云“齐朝（北齐）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俛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可见学习鲜卑语是北齐青年的“要事”，是通往仕途的台阶。在这种氛围之下，孝文帝断北语改革的成效就大打折扣了。

其二，倡导胡俗。“胡俗”在这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和风俗习惯等。鲜卑人在与汉族长期相处过程中，既有鲜卑人受汉族文化影响而汉化的一面，也有汉人受鲜卑文化影响而鲜卑化的一面。如果从文化和习俗考察某个具体人物，有时很难区分他（她）是胡还是汉，往往会兼具汉胡两种身份。如北齐文宣帝刚即位时，既尊崇孔子，“敦述儒风”，又“袒露形体，涂傅粉黛，散发胡服，杂衣锦彩”^③亦胡亦汉。但从总的趋势和上层来看，胡俗处于主导地位。如高欢就“使斛律金作《敕勒歌》”，他本人“和之”^④说明高欢对《敕勒歌》非常熟悉，并予以提倡。和士开虽为人轻薄，但因他“能弹胡琵琶”，遂与文宣帝“亲狎”。^⑤祖珽因擅长“胡舞”、会弹琵琶及以“胡桃油以涂画”^⑥而得到高湛的器重。北齐幼主高恒“盛为无愁之曲，帝自弹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人间谓之无愁天子”。^⑦由此可见，东魏、北齐从高欢到高恒都极力倡导胡俗。

从习俗的流行规律来看，往往是上行下效。帝王偏爱、喜好和倡导胡俗，必然带动整个社会崇尚胡俗。握槊是北魏中后期开始流行的一种“胡戏”，《魏书·蒋少游传附范宁儿传》载“赵国李幼序、洛阳丘何奴并工握槊。此盖胡戏，近入中国……世宗以后，大盛于时。”东魏时期，西南道大都督高昂与北豫州刺史郑严祖握槊，御史中尉刘贵因有急事派人去叫郑严祖，但高昂“不时遣，枷其使”。^⑧可见高昂对握槊的迷恋程度。北齐武成皇帝“性好握

① 《北齐书》卷39《祖珽传》。

② 《北齐书》卷24《孙搴传》。

③ 《北齐书》卷4《文宣纪》。

④ 《北齐书》卷2《神武纪下》。

⑤ 《北齐书》卷50《恩幸·和士开传》。

⑥ 《北齐书》卷39《祖珽传》。

⑦ 《北齐书》卷8《幼主纪》。

⑧ 《北史》卷31《高祐传附翼子昂传》。

槃”，和士开就“善于此戏，由是遂有斯举”。^①和士开因常与胡后“对坐握槃”，^②遂与胡后勾搭成奸。北齐后主时，寿阳陷落，号称“三贵”的韩凤与穆提婆“闻告败，握槃不辍”。^③尚书右仆射冯子琮的几个儿子都喜欢握槃，冯子琮被绞杀、尸体到家时，“诸子方握槃，闻库车来，以为赐物，大喜，开视乃哭”。^④再如帝王喜欢胡舞，魏收就充分展示这方面的才能。^⑤而且，一些人为了迎合帝王的喜好，也必然会仿效胡俗。有人就曾经说：“高齐出鲜卑种，性喜琵琶，故当时朝野之干时者，多仿其言语习尚，以投天隙。”^⑥对少数民族音乐的喜爱更是如此。从文襄帝高澄到后主高纬越来越重视胡乐。《隋书·音乐志中》载“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由此可以看出东魏、北齐在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胡化程度。

其三，“大诛元氏”，改复本姓。孝文帝曾把拓跋氏改为元氏，天保十年（559），北齐文宣帝高洋听信太史“今年当除旧布新”之言，决定“诛诸元（氏）以厌之”，先在五月杀始平公元世哲、景武等25家，将特进彭城公元韶等十九家囚禁于京畿地牢；后在七月大开杀戒，只要“父祖为王”、“身常贵显”及“兄弟强壮”者，一律斩于东市，“其婴儿投于空中，承之以槃”。^⑦前后总共杀了721人，“悉弃尸漳水，剖鱼者往往得人爪甲，邴下为之久不食鱼”。^⑧自昭成帝拓跋什翼犍以后的元氏上层的后代“并无遗焉”。^⑨北魏末期虽已出现了恢复旧姓的现象，但规模较小。天保十年（559），高洋诏令“诸军民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托携认，妄称姓元者，不问世数远近，悉听改复本姓”。^⑩高洋之所以会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盖与他对北魏后期“风俗流宕，浮竞日滋，家有吉凶，务求胜异。婚姻丧葬之费，车服饮食之华，动竭岁资，以营日富。又奴仆带金玉，婢妾衣罗绮，始以创出为奇，后以过前为丽，上下贵贱，无复等差”^⑪以及“元氏微弱”^⑫的认识有关，因此他要“反朴还淳”。^⑬需要说明的是，北齐只是要求“改复本姓”，但并没要求改姓高氏；虽有赐姓高氏的，但只是个别现象，这一点与西魏、北周有很大差异。

其四，“共轻中华朝士”。鲜卑贵族历来“自谓贵种”，鄙视汉人，“谓华人为汉儿，率侮诟之”。^⑭东魏、北齐最高统治者虽本为汉人，但已彻底鲜卑化，也鄙视汉人。因此，在

① 《北齐书》卷50《恩幸·和士开传》。

② 《北齐书》卷11《河南王孝瑜传》。

③ 《北齐书》卷50《恩幸传·韩凤传》。

④ 《北史》卷55《冯子琮传》。

⑤ 参见《北齐书》卷37《魏收传》。

⑥ 《颜氏家训》卷上《教子篇第二》。

⑦ 《北齐书》卷28《元韶传》。

⑧ 《资治通鉴》卷167，武帝永定三年。

⑨ 《北齐书》卷28《元韶传》。

⑩ 《北齐书》卷4《文宣纪》。

⑪ 《北齐书》卷4《文宣纪》。

⑫ 《北齐书》卷28《元韶传》。

⑬ 《北齐书》卷4《文宣纪》。

⑭ 《资治通鉴》卷171，宣帝太建五年胡注。

鲜卑人和鲜卑化的汉人口中，就出现了“汉儿”、“汉子”、“狗汉”、“汉狗”和“一钱汉”等带有侮辱性的词语，“鲜卑共轻华人”^①和“鲜卑共轻中华朝士”^②遂成了普遍现象。北齐与北周战争时，甚至还“驱夏人为肉篱”，并公开宣扬“当剉汉狗饲马，刀刈汉狗头，不可刈草也。”^③

更为突出的是，东魏、北齐的最高统治者只相信鲜卑人，对汉人基本信不过，甚至还时常怀有一种戒备心理。如高欢不仅将汉人称为“汉儿”，而且还认为“汉儿”“恐不济事”。^④东魏天平三年（537），当有人汇报“治河役夫多溺死”时，御史中尉刘贵就轻率地说“一钱汉，随之死！”^⑤在刘贵心目中，汉人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对汉人无丝毫怜悯之情。北齐文宣帝高洋在这方面更为典型，他曾试探骠骑将军、卫尉卿杜弼说“治国当用何人？”当杜弼回答“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⑥时，高洋很不高兴，以为杜弼是在讥笑他，遂对杜弼怀恨在心，在天保十年（571）借故将其杀害。尚书右仆射高德政常对高洋说“宜用汉人，除鲜卑”，高洋心怀不满，将其斩杀，还找借口说高德政“教我诛诸元，我今杀之，为诸元报仇也”。^⑦高洋的夫人李祖娥是赵郡李希宗的女儿，“容德甚美”，到高洋将建中宫时，高隆之和高德正等人认为“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宜更择美配”。^⑧高阳康穆王高湜因是高欢的第十一个儿子并依仗与文宣帝关系密切，在汉族官员面前气高趾扬，即使对文宣帝的岳父、护军长史张晏之也不予理睬。文宣帝问其原因，高湜直截了当地说“无官职汉，何须礼。”^⑨文宣帝的太子高殷常召集诸儒宣讲《孝经》，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结果被其父高洋视为“得汉家性质，不似我”，^⑩使其太子之位岌岌可危。

高殷即位后，北齐宫廷内部开始明争暗斗。从尚书右仆射杨愔被杀事件中，可以看出当时对汉人的鄙视以及宫廷斗争的激烈程度。高殷是文宣帝高洋皇后李祖娥的儿子，李皇后又是汉族；高演和高湛是太皇太后娄氏之子，娄太后是鲜卑族。杨愔与尚书左仆射平秦王归彦、侍中燕子献和黄门侍郎郑子默四人共同接受遗诏，辅政高殷，结果遭到了高演和高湛的嫉恨。废帝乾元年（560）二月，高演和高湛率领高归彦、贺拔仁、斛律金突然拘捕了杨愔，娄太后一方面对高殷大加斥责，另一方面又气愤地说“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姬斟酌。”在娄太后的威逼之下，李皇后只能不住地拜谢，其子废帝高殷只好胆怯地说“天子亦不敢与叔惜，岂敢惜此汉辈？但愿乞儿性命，儿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处分。”^⑪随后高演将杨愔、燕子献、郑子默和领军大将军朱浑天和、侍中宋钦道全部杀害。胡三省从这一事件中

① 《资治通鉴》卷157，武帝大同三年。

② 《北齐书》卷21《高乾传附弟昂传》。

③ 《通典》卷200《边防十六·盐漠念》。

④ 《北齐书》卷21《高乾传附弟昂传》。

⑤ 《资治通鉴》卷157，武帝大同三年。

⑥ 《北齐书》卷24《杜弼传》。

⑦ 《北齐书》卷30《高德政传》。

⑧ 《北史》卷14《后妃传下·齐文宣皇后李氏传》。

⑨ 《北齐书》卷10《高祖十一王·高阳康穆王湜传》。

⑩ 《北齐书》卷5《废帝纪》。

⑪ 《北齐书》卷34《杨愔传》。

得出“鲜卑之势素盛，华人不足以制之”^①的结论。这说明汉族即使贵为皇后仍要受到高氏集团核心人物的摆布，更何况其他汉人。

北齐后主高纬在位时，对汉人更加歧视和压抑。当时，录尚书事高阿那肱、侍中城阳王穆提婆和领军大将军昌黎王韩长鸾“共处衡轴”，号称“三贵”。^②韩长鸾常骂汉族朝士为“汉狗”，高阿那肱则大骂“汉儿多事”。^③武平四年（573），韩长鸾一手制造了崔季舒等人的冤案。^④作为一个武夫，他对文官带有很大的偏见，尤其对汉族朝士更是颐指气使，动辄就破口大骂“汉狗大不可耐，唯须杀之！”^⑤可见他们对汉族文官的蔑视程度。

其五，重用胡人。早在北魏末期，高欢就重用胡人，他曾对高澄面授机宜说“浑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迺直，终不负汝。”^⑥斛律金是朔州敕勒部人，为人敦厚，擅长骑射，“行兵用匈奴法”，颇受高欢的器重和倚赖。高欢曾告诫高澄“尔所使多汉，有谗此人者，勿信之。”^⑦可见胡人在高欢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尽管史书中说高欢“杂用夷、夏，有抚御之术”^⑧但从总体来看，他所信任和倚重的主要是鲜卑人和鲜卑化的汉人，对汉人基本信不过。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他对高昂所说的一番话，充分反映了他的这种心理。

在东魏北齐时期，六军宿卫之士分为六坊。北齐帝王对六坊的用人标准要求很高，“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陈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对六坊的训练都高度重视，高洋甚至要亲自“简练六坊之人”。高欢以鲜卑创业，将鲜卑人视为勇士，从他开始，“卫士皆用鲜卑”。而对于“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虽然也将他们称为“勇士”，但只让他们“以备边要”，^⑨绝不允许进入卫士行列。到北齐后主高纬时，又把“西域胡”作为重要军事力量之一，^⑩汉族官兵仍然入不了主流。

东魏、北齐之所以会出现反汉化趋势，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如下几点尤为重要：

一是东魏、北齐统治集团主要是由六镇鲜卑贵族和河北汉族地主组成，孝文帝全面汉化改革后，使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得以汉化，但六镇官兵仍处于鲜卑的氛围之中，在语言、习俗等方面继续保留着鲜卑固有的东西，汉化程度很低。在他们执掌政权之后，更多地彰显着鲜卑文化，因此，史书中就留下了很多东魏、北齐胡俗盛行的记载。

二是高欢军事集团依靠六镇鲜卑贵族起家，高欢创业和发展的群众基础主要是鲜卑人或鲜卑化的汉人。六镇起义和河北起义失败后，部分六镇鲜卑官兵被尔朱荣控制。尔朱荣死后，尔朱兆“乃分三州六镇之人，令王（高欢）统领”。^⑪这批官兵成了高欢的基本力量，

① 《资治通鉴》卷 168，武帝天嘉元年二月。

② 参见《资治通鉴》卷 171，宣帝太建五年正月。

③ 《北齐书》卷 50《恩幸·高阿那肱传》。

④ 参见《北齐书》卷 50《恩幸·韩凤传》。

⑤ 《资治通鉴》卷 171，宣帝太建五年正月。

⑥ 《北齐书》卷 2《神武纪下》。

⑦ 《北史》卷 54《斛律金传》。

⑧ 《资治通鉴》卷 157，武帝大同三年。

⑨ 《资治通鉴》卷 163，简文帝大宝元年。

⑩ 《资治通鉴》卷 171，宣帝太建五年。

⑪ 《魏书》卷 75《尔朱兆传》。

即使建立北齐政权后，这支军队也是高氏军事集团的骨干，换言之，紧紧追随着高氏军事集团的主要是鲜卑人或鲜卑化的汉人。因此，无论从感情、奖赏还是巩固政权而言，高欢及其后代都会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些人的利益。而且这些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汉族文化缺乏兴趣，高欢要依靠他们，自然会顺应他们的固有习俗。如鲜卑族库狄干“鲠直少言，有武艺”，但“不知书，署名为干字，逆上画之，时人谓之穿锤”^①，被封为章武郡王。另一方面，在高欢父子心目中，迁到洛阳且已汉化的鲜卑人几乎完全失去了鲜卑族的特质，变得比较懦弱，极有必要重振鲜卑的雄风。高洋就认为，“顷者风俗流宕，浮竞日滋”，现在应当“反朴还淳”。^②他曾因北魏孝庄帝的侄子元韶“好儒学”、“华而不侈”，亲自“剃（元）韶须髯，加以粉黛，衣妇人服以自随曰‘我以彭城为嫔御。’”他以此讥笑“元氏微弱”，将其“比之妇女”。^③

三是对汉人歧视鲜卑人，鲜卑人亦怀有一定的报复心理。如侯景就很瞧不起高欢父子，他曾在高欢的故交司马子如面前坦率地表达对高欢之子高澄的蔑视，称其为“鲜卑小儿”。^④既然汉人如此歧视鲜卑人，鲜卑化的高氏集团自然会予以报复，鄙视汉人，出现了“鲜卑共轻华人”的局面。另一方面，汉族世家大族“自以门阀素高”，时常流露出对鲜卑的不屑，使高氏统治集团对他们怀恨在心。比较典型的就是崔凌“每以籍地自矜”，并在私下里称高澄为“黄颌小儿”，认为他未必能“堪当重任”。高澄为此对崔凌怀恨在心，怒骂崔凌“我虽无堪，忝当大任，被卿名作黄颌小儿，金石可销，此言难灭！”^⑤

四是在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和南朝三足鼎立的背景下，高氏集团需要千方百计地笼络鲜卑族官兵，使其效力，必然会顺应他们的习性和习俗。高欢曾对杜弼说“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⑥高欢十分清楚，在西有宇文泰、南有梁武帝竭力招抚和吸引的情况下，如果对自己的部下管理太严，就会使一部分人投靠西魏，一部分人投靠萧梁，就会动摇立国基础。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高氏集团自然会宽容甚至纵容反汉化的行为。

五

与东魏、北齐相比，西魏、北周不仅对汉化政策反扑的程度要轻许多，而且还不断调适民族关系。西魏、北周对汉化政策的反扑，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恢复鲜卑旧姓。北魏末期即已出现了恢复旧姓的做法，但只是个别现象。西魏时期，已把恢复代北旧姓活动推向高峰。大统十五年（549），“初诏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

① 《北史》卷54《库狄干传》。

② 《北齐书》卷4《文宣纪》。

③ 《北齐书》卷28《元韶传》。

④ 《北齐书》卷2《神武纪下》。

⑤ 《北齐书》卷23《崔凌传》。

⑥ 《北齐书》卷24《杜弼传》。

令复旧”^① 即将元氏恢复为拓跋氏，将原改为汉姓的再重新改回原来的胡姓。恭帝元年（554），宇文泰下令“复姓拓跋氏。九十九姓改为单者，皆复其旧。魏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灭绝。泰乃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次者为九十九姓，所将士卒亦改从其姓”。^② 西魏的做法不仅否定了孝文帝的某些汉化政策，而且还影响和带动了北齐。天保十年（559），北齐文宣帝高洋也下令恢复鲜卑旧姓。至此，孝文帝改姓氏的改革成果已基本消失殆尽。

其二，盛行鲜卑语。孝文帝严禁鲜卑人说鲜卑语，并取得了较大成效。但到北周时期，鲜卑语又重新流行起来。如荆州刺史长孙俭在接待原梁岳阳王萧詧时，“大为鲜卑语，遣人传译以问客。客惶恐不敢仰视”。^③ 再如中外府外兵参军事虞庆则“善鲜卑语”。^④ 周武帝主要说鲜卑语，他在云阳宫对群臣讲话就用鲜卑语。^⑤ 天和四年（569），他“口号鲜卑，问讯众僧”，因多数僧人根本不懂鲜卑语，所以几乎无人接话，后来法藏“作鲜卑语答，殿庭僚众，咸喜斯酬”。^⑥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周武帝还用鲜卑语撰写了一卷本的《鲜卑号令》。

其三，重用胡人和胡化的汉人。在八柱国中，宇文泰、元欣、独孤信和侯莫陈崇是鲜卑族。李虎虽为汉族，但已胡化，西魏时即被赐姓为大野氏。赵贵原为天水南安人，其祖父赵仁“以良家子镇武川，因家焉”。^⑦ 赵贵也已胡化，被赐姓乙弗氏。于谨和李弼虽为汉族，但因几代生活在边境，都已基本胡化。在十二大将军中，元赞、元育、元廓、宇文导、侯莫陈顺、达奚武、豆卢宁、宇文贵、贺兰祥等多数是鲜卑族；李远等少数汉人因数代久居边地，长期浸染胡风，也都基本胡化。如李远“其先陇西成纪人”，其祖父李斌“袭领父兵，镇于高平，因家焉”。^⑧ 杨忠原籍为弘农华阴，其高祖元寿在魏初“为武川镇司马，因家于神武树颍”。杨忠跟随宇文泰“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⑨ 周武帝、齐王宇文宪和内史王轨等人都直接称其为“普六茹坚”。^⑩ 整个北周时期，领导集团核心层的民族结构主要是鲜卑族和已胡化的汉人，由此可见西魏北周的用人趋向。

其四，赐汉人为胡姓或汉人改为胡姓。这二种情况是对汉化政策最为典型的反扑。早在北魏时期就有赐姓和改姓现象。如朔方人宿石为夏的建立者匈奴人赫连勃勃之弟文陈的曾孙，其祖父若豆根被北魏明元帝拓跋嗣赐姓宿氏。^⑪ 高句丽人高琳的五世祖高宗“率众归魏，拜第一领民酋长，赐姓羽真氏”。^⑫ 安定人梁御“因官北边，遂家于武川，改姓为纥豆

① 《北史》卷 5《西魏文帝纪》。

② 《资治通鉴》卷 165，承圣三年正月。

③ 《周书》卷 26《长孙俭传》。

④ 《北史》卷 73《虞庆则传》。

⑤ 参见《隋书》卷 42《李德林传》。

⑥ 《续高僧传·释法藏传》。

⑦ 《周书》卷 16《赵贵传》。

⑧ 《周书》卷 25《李贤传》。

⑨ 《周书》卷 19《杨忠传》。

⑩ 《隋书》卷 1《高祖纪上》。

⑪ 参见《魏书》卷 30《宿石传》。

⑫ 《周书》卷 29《高琳传》。

陵氏”。^①扶风平陵人奚炽的祖先在汉灵帝时因避奚武之难，“亡奔匈奴，遂为部落大人。后魏南徙，子孙因家于代，赐姓纥豆陵氏”。^②昌黎徒何人豆卢宁，“其先本姓慕容氏，前燕之支庶”，其高祖慕容胜在北魏道武帝皇始初“归魏，授长乐郡守，赐姓豆卢氏，或云避难改焉”。^③太原祁人王轨“世为州郡冠族。累叶仕魏，赐姓乌丸氏”。^④当然，北魏时期赐姓对象以少数民族为主，对汉族赐姓比较少见。

西魏、北周时期，对汉族大臣赐为胡姓的人数大为增加。据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十二月诏书称，在宇文泰执掌政权时，“文武群官，赐姓者众”。^⑤从相关文献记载来看，西魏、北周对汉族大臣赐姓比较普遍。《周书》就记载了韩褒等30人被赐胡姓，李和等25位汉族大臣被赐姓宇文氏。《北史》记载了杨尚希等6人被赐姓。《旧唐书》记载李虎被赐姓大野氏。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周甚至出现了女性被赐姓的现象，如李贤妻吴氏被赐姓宇文氏。^⑥周武帝还曾敕令鲍宏编修《皇室谱》一部，共有三篇，其中有《赐姓》一篇。^⑦

能在史书中留下记载的毕竟都是具有较高职位的人员，对于一般民众，就很难考察清楚他们被赐姓的具体情况。但从常理推测，普通民众改汉姓为胡姓的人数一定不少。因为改为胡姓是一种时尚，人们又有从众心理，自然会有一些人纷纷改姓。

总体来看，宇文泰执掌政权时是西魏、北周的赐姓高峰期。大致说来，赐姓是宇文泰的“权宜之制”。^⑧一是，在西魏时期，宇文泰时刻都想颠覆西魏王朝，就必须笼络各方势力，赐姓则为有效手段之一。二是，宇文泰军队中的官兵多为六镇鲜卑和鲜卑化的各族人，这些人大都保持着少数民族的习性，宇文泰需要他们的忠诚、服从和支持，自然会迎合这些人保持少数民族习性的心理需求。三是，宇文泰在与高欢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不少，需要大量补充人员，因此“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⑨新招募的将士多数不是鲜卑人，宇文泰需要用心协调鲜卑将士与汉族等其他民族将士的关系。赐姓有助于消除鲜卑族与汉族的民族界限，减少民族隔阂，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四是，结成维系鲜卑族和汉族等其他民族以及宇文泰统治集团与下层的纽带。宇文泰赐姓的用意之一，是想通过部落组织形式，使被赐姓的上层成为部落首领，使被赐姓的下层军人成为嫡系部队，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所以，赐姓成了联系鲜卑族和汉族等其他民族以及宇文泰统治集团与下层的纽带。宇文泰长子北周明帝在位时，发展了宇文泰的恢复旧姓政策，他在558年颁布诏书称“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称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关中，宜改称京兆人。”^⑩使聚集在关中地区之胡、汉都成为“京兆人”，进一步把各个民族联系在一起，努力消除地域界限，减少民族矛盾。其

① 《周书》卷17《梁御传》。

② 《周书》卷30《奚炽传》。

③ 《周书》卷19《豆卢宁传》。

④ 《周书》卷40《王轨传》。

⑤ 《周书》卷8《静帝纪》。

⑥ 参见《周书》卷25《李贤传》。

⑦ 参见《隋书》卷66《鲍宏传》。

⑧ 参见《周书》卷8《静帝纪》。

⑨ 《周书》卷4《文帝纪下》。

⑩ 《周书》卷4《明帝纪》。

五,与宇文泰的复古心态有一定关联。史书记载他“性好朴素,不尚虚饰,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①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西魏、北周虽有对汉化政策反扑和重新胡化现象,但也有对孝文帝以来汉化政策的回归现象。宇文泰及其子孙既对汉化与反汉化进行反思,又对汉族与鲜卑族的关系进行调整,还对西魏、北周与突厥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尤其从周武帝开始,北周不断加大调适民族关系的力度,最终回归到汉化之路,消灭了仍然坚持鲜卑化的北齐。北周的反思、转向与调适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允许恢复旧姓及终止改姓和赐姓政策。叱罗协在西魏恭帝三年(556)被赐姓宇文氏,保定二年(562),他通过晋荡公宇文护疏通,使周武帝同意其恢复旧姓,^②说明赐姓政策已有所松动,表明北周已经对汉化政策反扑活动进行反思并逐步转向。大象二年(580),周静帝下令废止改姓政策,诏书要求“诸改姓者,悉宜复旧”,^③表明北周进一步转向。大定元年(581年),又下令“已前赐姓,皆复其旧”,^④废止赐姓政策,这样就彻底终止了西魏、北周对汉化政策的反扑活动。

其二,提倡儒学。大统年间,宇文泰采纳苏绰建议,“革易时政”,颁布六条诏书,让地方官员遵照执行。六条诏书中无不体现儒家思想,如人君要“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平,躬行俭约”;要对百姓“教之以孝悌,使民慈爱;教之以仁顺,使民和睦;教之以礼义,使民敬让”。^⑤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即位后,“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⑥周武帝于天和元年(566)五月庚辰亲自为大臣们讲解《礼记》。天和三年(568)八月癸酉,他又亲自为百僚及沙门、道士等讲解《礼记》。建德二年(573)十二月癸巳,周武帝招集大臣及沙门、道士等“辨释三教先后”,最终确定“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释教为后”。^⑦

其三,改穿汉服。从宇文泰到周宣帝大象元年(579)之前,北周君臣大致穿胡服。大象元年(579),周宣帝受朝于露门,“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⑧鲜卑和鲜卑化的汉人从此在服饰方面又重新汉化。

其四,信任和倚重汉人。宇文泰对汉人苏绰的信任、器重以及双方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最为典型,与汉人王轨无话不说的亲密程度也很能说明问题。

其五,不断调适民族关系。西魏、北周时期,北方先后崛起的柔然和突厥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西魏、北周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适与柔然、突厥的关系。西魏先是以和亲和忍让、妥协的方式,积极争取柔然,后来又把精力放在争取突厥上面。西魏、北周主要通过如下三种手段,调适与突厥的关系:一是将降服西魏的柔然部落人马全都交给突厥,“以快可

① 《周书》卷4《文帝纪下》。

② 参见《周书》卷11《晋荡公护传附叱罗协传》。

③ 《周书》卷8《静帝纪》。

④ 《隋书》卷1《高祖杨坚纪上》。

⑤ 《周书》卷23《苏绰传》。

⑥ 《周书》卷4《明帝纪》。

⑦ 《周书》卷5《武帝纪上》。

⑧ 《周书》卷7《宣帝纪》。

汗之意”，表达与突厥“共敦邻好”^①的诚意。二是与突厥和亲，以结成并巩固与突厥的同盟关系。三是经济援助和高规格招待。为了紧紧拉住突厥，北周每年送给突厥“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常以千数”。^②西魏、北周不断调适与突厥的关系，收到了显著效果。一方面，西魏、北周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减少了突厥侵扰之忧，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内部改革和发展；另一方面，西魏、北周与突厥结成了军事联盟，共同对付东魏、北齐。

综上所述，西魏、北周虽有胡风、胡俗回潮或对汉化政策反扑现象，但与东魏、北齐相比，回潮的幅度较低，范围较窄。从总体来看，西魏、北周主要是对孝文帝汉化之路的逐步回归和对民族关系的不断调适，使其民族矛盾比较缓和，政权比较稳固，势力不断壮大，国力日渐增强，为消灭北齐、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魏、北周新的汉化，掀开了隋唐时期民族融合的新篇章，为后来隋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反观“地半天下，国富兵强”^③的北齐，因胡化越来越重，矛盾突出，最终走向了灭亡之路。

（本文责任编辑 宋培军）

· 书 讯 ·

吉林大学程妮娜教授著《古代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已由中华书局于2011年7月出版。

《古代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增补而成的，全书40万字，由绪论、汉至北朝时期东北民族地区建置、隋唐王朝东北民族地区建置、辽朝东北民族地区建置、金朝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元朝东北民族地区建置、明朝东北民族地区建置、清朝东北民族地区建置、余论等九章构成。《古代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试图从国家结构的角度对东北民族地区建置的起源、转型与发展进行梳理，以探讨古代中国不同时期东北民族地区建置的形式、特点与政治功能，进而阐述其对古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与巩固的关系。该书对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的梳理为我们了解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发展历程提供了极大方便，而作者从东北地区局部入手以阐明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建置进行管理是一种历史传统，也给我国的边疆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思路。

① 《资治通鉴》卷169，文帝天嘉四年。

② 《北史》卷99《突厥传》。

③ 《周书》卷19《杨忠传》。

CONTENTS

MONOGRAPH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uoba Xianbei (拓跋鲜卑) and the Hanization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Ma Xiaoli Cui Mingde (1)

Tuoba Xianbei and the Northern Dynasties experienced a complex hanization process from the relocation of Tuoba Liwei (拓跋力微) in 258 A. D to the substitution for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by Sui in 581 A. D. Although there was hanization in the periods from the first ancestor of the royal family of the Northern Wei to the earlier stage of the Northern Wei, the mainstream was the perseverance with their national customs and culture. The overall hanization policy was promo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Northern Wei, whereas some people of Xianbei rethought, exposed and criticized, and even attacked the overall hanization reform of Emperor Xiaowen, and Xianbei culture was once reemphasized. In that course, the attacks on the hanization policy in the Eastern Wei and the Northern Qi were fiercest and the non-Han customs became more popular. Though the non-Han customs relapsed in the Western Wei and the Northern Zhou, the adjustment on the hanization and the national relations was the main trend, and the potency and scope were lower, which ha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llapse of the Northern Qi, the unification of the North, and the prosperity of Sui and Tang.

Key Words: Tuoba Xianbei the Northern Dynasties hanization course

On Jinshi (进士) 's Entering Politics in Liao Dynasty Jiang Jinling (18)

This paper examines Jinshi's getting official position for the first time, the occupation mobility, the final Official position distribution and the effect and significance of entering politics for Jinshi, and believes that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Han officials and even the whole Han people were enhanced with amounts of Jinshi joining the Qidan ruling class and even some becoming the prime ministers. It thinks the Jinshi-dominated Han officials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border governance, spreading Confucius culture,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fucian tendency of the nomads in the north.

Key Words: the Liao Dynasty Jinshi get official position Han Confucius culture

A Study on the Judicial Reform and its Special Policy in the Border Areas in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Period Li Guanghe (28)

During the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authority tried to push on the frontiers judicial reform, because of the shortage of the judicial resources which due to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oblems, the reform had little progress. However, for adapting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borders and maintaining the national legal system, the various parties concerned proceeded the judicial basis, the application of law, as well as the judicial personnel professionalism formation. Nevertheless, the special policies still could not meet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the border areas.